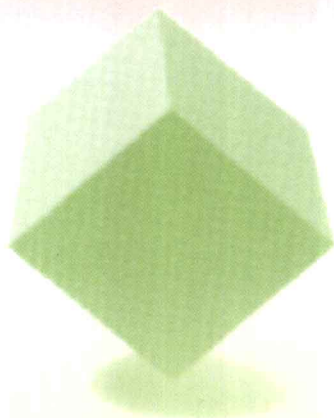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演进与评估

景维民 孙景宇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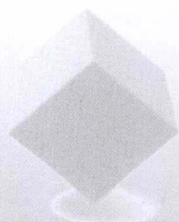
The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of
Economic Transition Stages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演进与评估



景维民 孙景宇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与评估/景维民, 孙景宇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58 - 6943 - 1

I. 经… II. ①景… ②孙… III.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289 号

责任编辑: 漆 熠

责任校对: 张长松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董永亭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与评估

景维民 孙景宇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 开 23.25 印张 380000 字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6943 - 1/F · 6195 定价: 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08 年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继续开来，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除了直接对改革开放的历程加以分析之外，还可以对原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这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展开：一个是纵向的历史维度，即将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发展历程相比较；另一个是横向的国际维度，即将其与和我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从历史维度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论著较多，而从国际维度来分析和评估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论著却大多是由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撰写的，并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所选择的模式和路径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给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估。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景维民教授等人的这部新作，则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从国际维度来分析和评估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必然要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可比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景维民教授等人所立足的基点就在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既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正是前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末期需要着力解决的中心任务。因此，以一个开放的视角，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比较，对这些国家各自的转型进展加以科学的比较和评价，这加深了我们对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理解和认识，有利于转型国家发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正确道路。

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还需要解决比较什么的问题。毫无疑问，经济转型时至今日，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已经发生了重大分化，这不仅表现

在他们选择的社会制度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还体现在他们在经济绩效方面的巨大差异。景维民教授等人并没有仅仅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差异的比较上，而是从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寻俄罗斯、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试图找出决定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和条件，在这些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探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经济转型上的差异。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没有使其研究结论停留在单纯地就事论事层面，而是试图从现实中抽象出更一般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则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有利于找到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因素和发展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推动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更关键的是如何比较的问题。在这方面，景维民教授等人主要采取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度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总体上来把握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共性特征，找出其中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质变点，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来对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展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关注经济转型过程中量的累积，更关注经济转型过程中质的飞跃，从而较好地实现了其研究目的，做到了在从总体上把握经济转型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研究不同转型国家各自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差异性。解决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中，相关的定量分析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质变特征，而相关的阶段性研究又没有从转型国家总体上来把握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共性特征的不足。并且，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在分析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展差异性的基础上分别对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作进一步的考量，具体分析不同转型国家各自在经济转型进程中所处的位置，找出他们进一步发展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上确定经济转型的发展趋向和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

景维民教授长期致力于转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思维活跃、勇于创新的研究团队。近几年来，这个研究团队潜心钻研，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而这部著作则是所有这些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现。希望在这部著作之后，能够不断看到这个研究团队的新作问世。

是为序。

朱光华

2008年1月

导 论

20 世纪后期，欧洲和亚洲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 30 多个国家开始了放弃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使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驱动作用的经济转型。时至今日，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在 GDP 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大分化：以捷克、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转型国家成功地跨越了鸿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则陷入了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① 与前苏联、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虽然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那么，如何认识转型国家出现的这种分化？进一步地，如何对转型国家的转型进展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与比较，从而通过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改进各自的差距和不足，进而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正确道路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转型国家市场化的现实状况有一个正确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我们找到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因素和发展条件，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一、如何理解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市场化

（一）对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现状

经济转型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在对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如何认识转型国家的转型纲领、具体目标、路径以及所建立的各不相同的特殊制

^① 埃里克·伯格洛夫、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于吴敬琏主编：《比较，第 2 辑》，中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2 页。

度安排及其绩效，所有这些，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挑战在对经济转型进展的研究上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目前国内外对经济转型进展的研究比较混乱，理论界在如何认识转型进程、如何理解市场化、如何理解转型绩效与经济绩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同的研究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设置的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的差异，导致了对转型进展的测度结果也各不相同，个别研究结论间还存在着矛盾，彼此相互冲突。

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直是国外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学家所推崇。“华盛顿共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转型的三大支柱，它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由于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因而在“华盛顿共识”看来，转型应当是一步到位的，不需要对转型进程加以特殊的关注。然而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转型并不是像“华盛顿共识”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照搬更好的模式的问题，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转型不仅是“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轨，还必须关注更加微小的方面，如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近年来，通过反思“华盛顿共识”，演进——制度学派已经开始关注对转型进程的研究，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他们强调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该有不同的制度的演进道路和方式，因此他们认为，对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转型国家而言，它们各自的经济转型进展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在这方面不存在对转型国家整体而言统一的、一般的共性特征。

与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从转型一开始所采取的就是渐进的和增量改革方式。在20多年的转型历程中，中国经济转型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从农村到城市，转型进程逐步推进，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而中国学者对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起步较早，为了评价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和转型绩效，不同学者在定量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时从不同角度设置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学者更为关注的只是中国自身的转型进程，大家的精力都集中于对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研究上，缺乏对转型国家整体经济转型进程的系统研究。

（二）对市场化的不同理解

转型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市场化的过程。但是应当看到，市场化并不是转型国家的最终目的，而只是转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手段，因此经济转型又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化。应当说，正是由于学者们在对转型国家市场化的内涵的理解上没有达成共识，因而不同的研究设计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度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导致了学者们在对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研究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市场化呢？

国内学者在对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学者们对转型国家市场化的内涵的认识来看，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将市场化等同于自由化。王萍认为，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考察市场化及其测度，就会着重于市场化进程中物的关系和显在的方面，而不是着眼于市场化进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互动，没有把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和运作以及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上。她认为经济市场化的过程，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保障的过程，因此经济自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的核心，自由交易从而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和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①

另一种观点将市场化看作是自由化的对立面。宋德勇认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以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步，它包括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主要是市场化，即逐步推进对计划机制的改革，建立市场机制的各个要素，扩大其作用范围。主要内容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价格改革、激励机制的建立、放松管制和取消指令计划等；在前苏联、东欧，经济运行机制转变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价格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反垄断。^②

① 王萍：《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及其测度指标设置研究》，载于《现代财经》，2002年第6期。

② 宋德勇：《经济转型问题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更多的研究者是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来看待市场化的。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就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分配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和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课题组认为:(1)“市场化”是表示经济体制转型的概念,不包含“分工”、“商品率”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2)“市场化”属经济关系的表层——交换关系的变革,即使在这种表层变革的范围内,“市场化”也只是起到“破”的作用,其中“立”的重要内容——市场规范化及国家调控科学化等,并不能为“市场化”所涵盖。至于企业制度改革,虽然与市场化密切相关,但逻辑上属经济关系深层——财产关系的变革,并不在“市场化”的范围之内。(3)纯粹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要不是采取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方式,从而并未破坏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干预涉及的范围就不应划入非市场部分。^① 常修泽、高明华认为,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将市场化仅限于“交换关系的变革”,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仅限于“破”的方面,这种界定过于狭窄。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体”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② 陈宗胜等人的研究则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不断地增大,以至于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进而使市场经济体制从产生,逐步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在这些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逐步增强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各个方面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如分散化、多元化、自利性、自主性、少干预、秩序化、规范化等,这就是市场化的表现特征。这些特征体现着市场化的理论含义,同时制约着测度市场化的指标的设计和选择。^③

事实上,对市场化内涵的准确理解离不开对市场化历史的考察。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市场化运动,一次开始于16世纪,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从自然经济逐步演化成市场经济;另一次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

①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载于《宏观经济管理》,1996年第2期。

② 常修泽、高明华:《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载于《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③ 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4页。

全面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化运动；第三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以原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三次市场化运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需要用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首先，第二次市场化运动更加接近于经济自由化，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自由化的产物。其次，为了将第一次和第三次市场化运动加以区分，我们可以将市场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市场化泛指一国经济中市场产生、发育、成长和成熟的自然的动态和演化过程，主要表现为整个经济中的自给性部分不断减少，商品性部分不断扩大，进而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迟或早、或先或后都要经历市场化的过程。狭义的市场化则专指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即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不断渗透和替代的过程，它表现为市场机制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制度转型，对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组织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持续不断地增大，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进而使市场经济从产生、逐步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计划机制的作用在微观领域内越来越弱，市场的自然调节作用越来越强的过程。本书主要研究狭义的市场化。

（三）对转型国家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在当前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大多将经济转型的动因归结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从而在假定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展开分析，这使得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以及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只有通过采取进一步市场化的办法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但是我们只要向前回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存在着严重弊端和缺陷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曾经为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所广泛接受，而且在短期内给前苏联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这说明，将经济转型的动因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这样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转型国家的唯一选择。事实上，在转型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自身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而如果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发展趋势和演进方向有一个准确的把握，那么转型国家就会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因此，只有把经济转型作为一个整体，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对经济转型作历史的、批判性的全面检视，才能够深入探究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从而对其今后

的演进趋向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

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表现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并且,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和突破。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它由于将生产的剩余价值以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方式进行分配,因而这种资本积累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①因此,自16世纪西方国家开始了广泛的市场化运动以来,市场化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与现代化的发展一直是同步的。而且市场经济从来就是开放的经济,在各个国家相继展开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发展使得市场经济体制内的资本积累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促使国内与国际社会重新安排结构,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中心和一个依附的外围。而正是这种“中心—外围”结构的存在造就了有等级的劳动分工以及生产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是不平衡的。由于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因而其国内的一部分生产剩余被转移到中心国家,这一方面加速了中心国家的自主中心式积累,从而推动了中心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使外围国家只能实现依附性积累,从而其经济现代化进程被推迟。这说明,中心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外围国家推迟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相区别的是,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正是这种等级性的存在使得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其发展演进在造就一部分国家发达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部分国家的欠发达。

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主要是出于外围国家为了突破“中心—外围”结构,从而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的愿望。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可以替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它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否定。也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确实使一部分国家摆脱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从而使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分裂成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全球割据格局。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按照国家

^①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技术进步对于生产已知的、特定的使用价值而言,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过程创新。生产过程创新可以使单个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并且在竞争的作用下,可以使整个行业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技术进步对于生产以前没有的、新的使用价值而言,主要表现为新市场的开发,即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可以使企业凭借其在产品生产上的技术垄断而获得垄断利润。

计划分配，因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并不能得到准确如实地体现，而是在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下被不断扭曲。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存在表明，由于缺乏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激励，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只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模仿所实现的模拟经济现代化，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的投入。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能推进经济现代化，而且会带来经济的不发达。因此，虽然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都在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对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是囿于当时的冷战格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使得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最终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经济转型。

由此看来，在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脱离世界市场而谋求独立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经济转型首先意味着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其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取代国家计划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型首先就是转型国家进行市场化，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重新回归世界市场，从而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应当看到，这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却是在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互动中进行的。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就必须转变自身社会经济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国家只有通过融入世界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够真正使市场取代国家经济计划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理顺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提升技术水平。但另一方面，随着转型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转型又会改变原来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又会随着世界市场的重新形成和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心—外围”结构。这样就有可能使本来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劣势的转型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而这同样会推迟它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体制转变和融入世界市场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应当如何在完成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同时来应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从而做到趋利避害，在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的同时，尽量避免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成为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可见对转型国家来说，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其最终目标，而市场化仅仅是转型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并且通过经济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从自然经济逐步演化而形成的市场经济，还是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全面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所形成的市场经济，都是具有明显等级特征的开放经济。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在当今社会，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的分工来看，同样是实行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完善，其国内的企业主要处于产业分工的上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前期投资巨大，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产品技术开发所需要的雄厚实力，因而只能将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产品拿来改造，利用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对产品的流程进行优化组合以降低成本，因而其国内企业往往是紧跟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后面，处于产业分工的下游。这些企业的产品由于技术成熟，替代品较多，因而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低。可见，在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而处于优势地位，其产业调整引导并制约着包括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实现体制转型，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建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只是表明我们已经融入到由统治这个经济世界的强国所确定的国际分工体系当中，但我们还没有建成“好的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还要被迫按照经济世界中心自身最终消费或中间消费的需要进行生产重组，即被“外围化”。毕竟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如何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最终摆脱被经济世界中心的统治，实现产业升级，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则是我们在不断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始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衡量转型国家市场化是否完成的标准应当是，它们是否已经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中去，即是否建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转型中的问题逐步转化为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时，市场化的初步目标就实现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转型国家所面对的任务就转化为如何抢占国际产业分工的上游，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划分

当前理论界对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也就是通过构建各种指标体系，来对各国的转型进程进行定量的测度。这种定量研究的优势

在于，它可以比较准确地对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进行评估，也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和检验。但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经济转型含义的理解以及测度指标选择的不同将导致最终测度结果的不同；二是在构建相关指标体系的时候往往会选取一些易于量化的指标，而忽略一些难于量化的指标，这种基于技术性需要而进行的忽略很容易遗漏掉一些真正反映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三是对经济转型进程进行定量测度虽然可以反映出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发生的连续性的量变过程，但无法反映出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质变性飞跃，而正是这种质变性飞跃使得经济转型进程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

随着对经济转型进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在对市场化进程进行定量测度的同时，开始从纵向角度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反映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质变过程。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将波兰 15 年的经济转型划分为四个阶段：1990 ~ 1993 年、1994 ~ 1997 年、1998 ~ 2001 年、2002 年至今。科勒德克指出，这个划分方法的依据是波兰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改革政策的变化，因为根据波兰宪法，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而每次选举都会使改革政策发生某些变化，但由于多数政党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入欧盟方面形成了共识，因此经济转型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民主化、融入世界经济、加入欧盟”。^① 俄罗斯联邦政府经济改革工作中心主任 B. 马乌以 2001 年为界，将俄罗斯的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② 2001 年之前的 10 年（一般认为俄罗斯正式的经济转型进程是从 1992 年初开始的）称为“后共产主义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俄罗斯面临着四大历史性挑战（任务）：首先是俄罗斯社会经历着“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挑战”，即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其次是俄罗斯社会经历着“后共产主义制度转型”，即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大规模私有化；第三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最后是重构俄罗斯的整个国家权力机构。B. 马乌认为，经过 10 年的艰难历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四个挑战中至少有三个已经基本结束：首先是宏观经济基本实现稳定；其次是“革命转型进程已基本结束，国家政权得以恢复，政治稳定与宏观经济稳定同步进行”；最后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制度转型已经完成”，即“决定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本质特征的原有政治制度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已得到彻底改造，而商品短缺已不复存在”。据此，B. 马乌认为，到 2001 年，俄罗斯结束

① 科勒德克：《波兰改革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比较》，载于《转轨通讯》，2004 年第 5 期。

② B. 马乌：《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十年》，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4 期。

了后共产主义转型,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时期。^①可见,B.马乌是依据转型期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来对俄罗斯的转型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的。我国学者冯舜华等人对俄罗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10年转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们从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角度将俄罗斯从1992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阶段:(1)“经济浪漫时期(1992~1993年)”,即实施“休克疗法”的阶段;(2)“现实主义时期(1994~1997年)”,即俄罗斯放弃“休克疗法”,进入“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细分为“政策调整阶段(1994~1995年)”和“萧条稳定阶段(1996~1997年)”;(3)“震荡恢复时期”(1998年开始)。^②帕尔·加斯伯和卡尔曼·米赛伊将匈牙利1990~2004年15年的经济转型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4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采用渐进主义的方法稳定宏观经济,同时采用一种更为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宏观和微观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1995~2001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保守与连贯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微观领域的经济改革加快”,包括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吸引外资、改革银行系统和养老金制度等;第三阶段为2001~2003年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宏观经济稳健政策出现逆转”,但是,受加入欧盟的影响,“法律、政策和体制协调的发展却加快”。^③由此可见,帕尔·加斯伯和卡尔曼·米赛伊是将转型战略、政策和宏观经济绩效相结合来划分匈牙利的经济转型阶段的。

对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与转型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中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例如,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92~1997年);(3)“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年开始大约需要10~15年),这一阶段又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4)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④吕炜则从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折点入手,提出了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阶段性划分。他认为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有两个

① B.马乌:《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十年》,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4期。

② 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421页。

③ 帕尔·加斯伯、卡尔曼·米赛伊:《匈牙利: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载于《转轨通讯》,2004年第3期。这两位学者分别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暨开发计划署欧洲与独联体国家区域局主任,布达佩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④ 赵旻:《论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四个阶段》,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是“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另一个是“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前一个转折点的标志为：（1）“短缺现象的普遍消失”；（2）“市场化取向不可逆转”。后一个转折点的标志为：（1）“所有的企业都被规范地纳入了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2）“一个能够灵活地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形成”。根据这两个转折点，吕炜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总体进程在1998年已经越过了“告别旧体制的转折点”，但离“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的转折点”还有比较遥远的路程。^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自发启动时期”（大致从1978~1992年以前）。这一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自发启动，然后逐步扩展到城市（从1984年起）；（2）“自觉推进时期”（大致从1992年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3）“全面加速时期”或“加速转型期”（世纪之交开始）。该课题组认为，所谓“转型加速期”，不是简单指经济社会某个领域或某项制度的变化过程，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过程”。在加速转型期，结构、机制、利益和观念将发生“临界水平”的转换，“一旦超越临界水平，旧的体制、机制、结构、观念和利益不再复归”。^②

总的来说，对经济转型进程的阶段性划分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并且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对经济转型理解和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学者们对转型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的标准不统一。有的侧重于从政府变革对改革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划分转型阶段；有的以不同时期所要完成的改革任务为依据划分转型阶段；有的则将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划分转型进程的不同阶段。其次，学者们对转型进程的阶段划分主要是针对各转型国家的具体案例分别进行的，而没有从总体上对经济转型进行阶段性划分。这种国别性的阶段性划分虽然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共性特征。那么，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换句话说，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转型国家的转型进程之间是否存在着共性特征？抑或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更

① 吕炜：《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折点研究》，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上）》，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进一步地看，如果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中存在着基本的共性特征，那么又应当如何在把握转型进程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和评估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的差异性？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经济转型进程有一个更加深入地理解。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反思，我们对经济转型进程及其阶段性划分的研究有以下认识：

（一）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经济转型过程中“量”的累积，还必须注意研究经济转型过程中“质”的飞跃，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

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是指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演化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不但包括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市场机制建设等体制转型问题，还包括法制建设、宪政转型、社会转型等制度建设问题，也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综合以往国内外对转型进程的研究，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它必然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这已经被转型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比重减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强等体制转型问题会比较突出，而到了经济转型的后期，法治化进程、政府职能的转换、金融市场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等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将会成为经济转型的更主要的内容和更重要的标志。这就是说，由于各个转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构成其市场运行基础的制度安排也并不相同，它们的市场化事实上并不是同质的，因而不能用简单的市场化程度来比较不同国家的转型进程，必须通过深入研究转型进程背后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判断。由此看来，如果缺乏针对性，单纯对经济转型进程的市场化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对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转型国家市场化进行推进状况，更主要的是研究这些国家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进程的其他因素和发展条件，特别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状况。只有对经济转型进程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把握准确，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路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应该通过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